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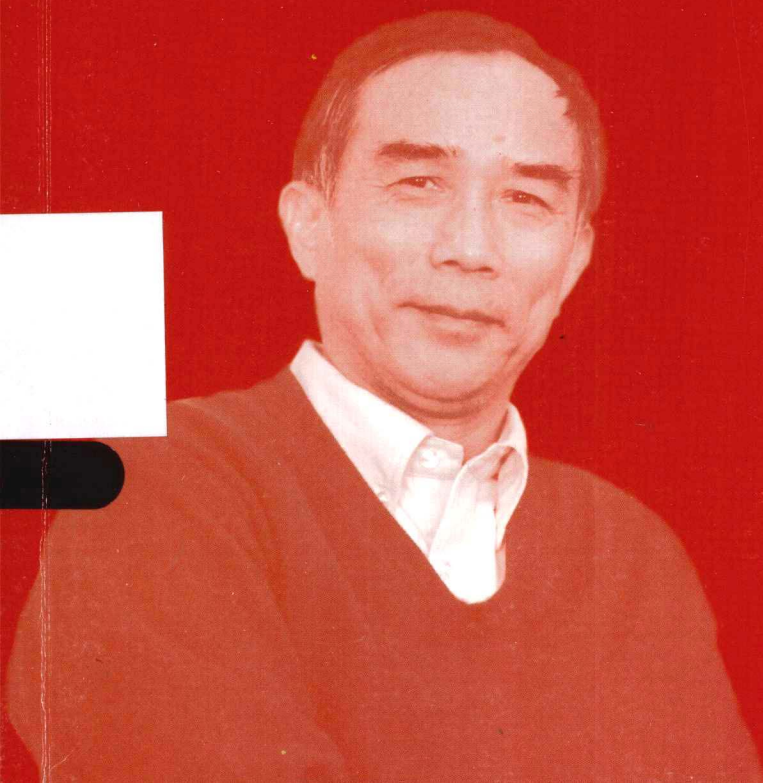
Anthology
of

Yu Zhongxian's
Translations

余中先 译文自选集

当代著名翻译家精品丛书

余中先
译 编



漓江出版社

当代著名翻译家精品丛书

余中先 译文自选集

余中先
译 编

漓江出版社

桂 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余中先译文自选集/余中先译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3. 5

(当代著名翻译家精品丛书)

ISBN 978-7-5407-6417-3

I. ①余… II. ①余… III. ①余中先—译文—文集 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2552 号

责任编辑:单 鹏

装帧设计:李星星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253000)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20.25 字数:285 千字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4-2671218)

《当代著名翻译家精品丛书》出版说明

文学翻译凝聚着翻译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本丛书为我国第一套由当代翻译家自选集组成的译作精品丛书。

本丛书的出版旨在便于读者花较少的时间读到值得优先阅读的名家名译,同时为广大翻译专业人员和有关教师、学生提供鲜活、生动的个案参考与经验借鉴,促进译德译风的纯正和翻译质量的提高。

本丛书现阶段主要以健在的翻译家为辑选对象。每卷由译家自选译作约30万字,包括中短篇小说和容量适中的长篇或长篇选译。小说之外,酌选诗歌、剧本、散文、评论。篇前对作家作品作简要介绍。

本丛书各卷前言为翻译家回眸一生经验的不可多得的心血之作,理论价值、实用价值很高,本社将单独辑册出版,他人不得转载。

漓江出版社编辑部

翻译比研究更基本

余中先

我的文学翻译工作,大致是从三十年前开始的。

三十年前,我考上了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文学的硕士研究生,决定从此毕生从事法国文学的研究、翻译。

当时,我曾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嚼别人没有嚼过的馍”,要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作家,当然,这个“别人”指的是在中国。读研究生时,刚从法国归来定居的梁佩贞教授讲授法国诗歌,让我们做一些翻译,我便选了以前还没有人翻译过的几位大诗人:奈瓦尔(十九世纪)、克洛代尔和苏佩维埃尔(二十世纪)。

一九八四年,我分配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颇有传统的《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我知道外文所应该算是国内研究外国文学的“国家队”,不仅图书资料丰富,而且还有一批学术研究方面卓有成果的师长,正是磨练人的好地方。我便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在了研究生期间有所接触的奈瓦尔、克洛代尔等几位作家上了。当时,我们编辑部每周得上班四五天,国家也还没有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我只得利用每周在家另外的两三天(包括星期天),研读和翻译了奈瓦尔、克洛代尔、季洛杜的一些作品,译稿放在了抽屉里。

那时,前辈柳鸣九先生正在主编一套“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研究丛书”,当时出版了《萨特研究》、《新小说研究》等好几种,在文学青年中反响还不错。他约我主编一本《克洛代尔研究》,这与我的兴趣是一拍即合,我就很痛快地答应了。于是,当即开始了准备,先翻译了克洛代尔的《缎子鞋》、《城市》、《给圣母马利亚报信》这三个剧本,打算在这些翻译工作的基础上,编辑那本“研究”。不久后,我结合《缎子鞋》的翻译,写了一篇叫《“不一”与“整一”——〈缎子鞋〉艺术框架的分析》的论文,先在全国性的法国文学研讨会上宣读,后又发表在创刊不久的《外国文学评论》上。原本还想继

续写下去,编下去,但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让我暂时中断了编书的计划。

一九八八年,我考上了国家教委(现在又回过来叫原先的称呼“教育部”了)的出国留学学生名额,到法国留学四年。等我写成了论文《克洛代尔戏剧中的中国》,顺利通过答辩,获得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已经是一九九二年年底了。

回国之后,柳鸣九先生主编的那套“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研究丛书”出版遇到困难,后来不了了之。我的一些稿子便始终躺在抽屉里睡大觉,不过,好在克洛代尔的两个剧本,都已经有机会在我留学期间在国内发表了,《城市》发表于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2)》中,而《缎子鞋》则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翻译克洛代尔的命运是如此,而奈瓦尔作品的翻译和出版则遇到了另一种曲折。出于爱好,我先后翻译了奈瓦尔的几篇小说和诗歌,本来已经跟漓江出版社说定了,要出版一种图文本,但后来策划该书的编辑脱产离职,这个选题便悬挂了起来,几年没有动静。最后,我忍不住,直接去找出版社的领导,领导换了一个责任编辑来做,才促使这奈瓦尔作品集姗姗来迟地出笼了,是为《火的女儿》(副题为:奈瓦尔作品精选)。那一年已经是二〇〇〇年,不过,好在这本书获得了全国外国文学优秀图书奖三等奖,也算是对我的一种安慰吧。

又是多年之后,翻译家李玉民教授与出版人楚尘先生合作,要出一套法国诗人的传记,我便主动承当了其中的一本《奈瓦尔传》(法国皮舒瓦、布里著),这是一种典型的学术考据式的人物传记。从二〇〇三年底起,到二〇〇四年八月,我花费了大半年业余时间,终于完成了厚达五百页的这本传记。几年前翻译奈瓦尔的小说和诗歌,对后来翻译传记实在是太有用了,因为在译传记时,传主奈瓦尔作品中的许多情节、掌故,我都已经了然于胸,译起来顺当多了。不过,《奈瓦尔传》以及这整套“法国诗人传记丛书”的出版还是费了一些周折,直到二〇〇七年,它才跟其他几本诗人传记一起,由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它的读者恐怕不会很多,但在业内人士的眼中,它肯定是很具有文献价值的。

做翻译,其实是我的副业,我的“专业”工作是编杂志,《世界文学》编了二十多年,而《外国文学评论》,我也参加了创刊期间的工作,先后有两年吧(1986—1987)。

从事《世界文学》的编辑工作后,没有太多的大块时间用来搞所谓内的“课题”,而只能用零星时间来做翻译。其实这样也好,因为,说实话,翻译比研究更基本,更在先,没有翻译,许多研究其实是开展不了的。也就是说,许多研究是在翻译的基础上进行的,尤其是外国文学翻译。

我在外文所工作多年,译的文学作品多,写的专题论文少,而专著则一本都没有。前几年,国内的研究界强调出专著,社会科学院的决策层和管理层也跟着起哄(或是带头起哄?)。记得当时流传有一种不成文的说法,说是不出专著就不能评正高的研究职称。对此,我很不以为然。至少,就我们外国文学研究界来说,我认为决不应该强调出专著。

我的观点很简单,先翻译,再研究。即便说得缓和一些,也是先翻译,同时研究。总之,先得了解,才能有发言权。而我们现在的许多研究,往往并不建立在翻译的基础上,当然更不建立在原著阅读的基础上。心中没有一张像样的文学地图,就在那里装模作样地做起综合分析、概括来,还美其名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研究体系。其实,国内的许多外国文学研究者,外语底子不很强,能勉强看懂原著就算不错了,他们往往根本就不了解文学状况的种种细节,就嚷嚷着要全方位地把握文学的整体发展。人往往不从原著出发,也不从翻译作品出发,而是从原著和翻译之外的某些东西出发,在那里建构宏大的批评话语结构,以种种吓人的学术名词炒作着理论、概念、术语……

我始终认为,外国文学的研究要以文本为基础,对文本的阅读、理解、分析、研究,是一步步来的。你可以阅读,但不一定去理解;你可以阅读并理解,但不一定去分析;你可以去阅读、理解、分析,但不一定作出有力的研究。现在有些人,根本不阅读,也不理解,更没有什么分析,却要作研究,想必其成果也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

而从文本出发,最直接的一项工作,就是翻译。从某种程度来说,它也是最难的,写论文,做研究,可以扬长避短,对自己不太熟悉,不太能把握的东西,可以避而不谈。做翻译就不能那样,不懂就得去问,去查资料,非得弄明白不可。

回头再说我自己工作中翻译和研究的关系。就我个人的工作习惯来说,写文章需要有大块的时间,而翻译则对时间的整块性没什么苛求,我随时都可以开始和展开翻译。另外,毕竟有《世界文学》的编辑工作要忙,也没有心思再扑在所谓的院级、部级的“重大课题”上,于是,我只能利用不上班的日子,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完成一部又一部法语文学作品的翻译。到如今,仍然是一部专著都没有,而文学作品却译了有四十来部。当然也不是没有研究,我的研究,大多体现在了译作的前言或后记上了。算来,这样结合了翻译而写的文字(不能算论文吗?)少说也有三十余篇了。

有些作品,我译是译了出来,但一直没有机会出版,例如萨罗特,我翻译了她的《金果》,但原定要出书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改变了计划,始终没有出版,给我些象征性的废稿费,稿子就拿回了家,跟其他一些“难兄难弟”一起躺进了抽屉。当年同

样打算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贝克特小说《马龙之死》，后来收在了陈侗先生策划的、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贝克特选集》中，是为其中的第二卷。

还有狄德罗的戏剧《他是好人？还是恶人？》，当年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做的论文就是“论狄德罗严肃戏剧理论”。我是结合研究做的翻译，在一九八四年就完成了译稿。但译本多年来无人问津，一开始投稿给《外国戏剧》，他们因故无法用，就一直搁在我的抽屉中，直到燕山出版社出《狄德罗精选集》，才把这个剧本收了进去，那已经是译本译出二十多年后的事了。

再有季洛杜，我翻译了他的两个剧本，分别为《厄勒克特拉》和《特洛伊战争不会发生》。国内的剧本发表园地很小，出版社大都不感兴趣，只有等待。多年后的二〇〇〇年，《特洛伊战争不会发生》终于发表在了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的《世界经典戏剧全集》（法国卷）里头。

还有阿波利奈尔，这位以诗歌创作而出名的作家，其小说写作也很有特色，我一直对他的小说感兴趣，并译了一些。但除了几个小短篇的译文在几本小说选（包括我自己编的《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法国卷》）和报刊上（如《南方周末》、《小说选刊》）发表之外，他的众多小说的译稿始终放在我变得越来越大手稿抽屉里……好几家出版社询问过，但结果都“无果”。直到二〇一〇年，浙江文艺出版社才在“经典印象”系列中收了我译的阿波利奈尔小说选集，题为《诗人的餐巾》。《诗人的餐巾》只收了我翻译的阿波利奈尔作品的小半部分，还有大半部分依然待编待出。

除了文学作品，我还曾翻译过经济、历史、哲学、政治方面的书籍。这一方面是为了锻炼我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作品的理解和把握能力，为我的文学翻译打基础，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完成“组织上”交代的“集体任务”。

我先是翻译过《法国农村史》（全名应该是《法国农村史的经济特征》），这是一本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论著，年鉴派大师马克·布洛赫的作品，我的大学同学车耳是本来的译者，但他翻译期间要出国，便在半途把担子推给了我。同学的事，该帮忙的就帮，我便硬着头皮把担子挑了起来。后来这本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余中先、张朋浩、车耳合译），为“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中的一种。这是我翻译“经济”和“历史”的一段“经历”。

还有另外两本，算得上是组织委托的任务，一本是《上帝、死亡与时间》（哲学家莱维纳斯的哲学讲稿），另一本是《神话与政治之间》（学者韦尔南的论文集），都是中法文化比较学会承担的翻译任务，和三联书店的合作项目，应该说，这两本书的翻译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而是“组织上对我的选择”。我只有硬着头皮上了，等到“上了

贼船”，才知道已经下不来了。原来，“哲学”翻译是那么难，那么不适合我来做，为翻译《上帝、死亡与时间》，我去补读了海德格尔的哲学著作，尽管如此，我还得承认，《上帝、死亡与时间》恐怕是我翻译作品中问题最多的了，读者肯定会发现种种差错。《神话与政治之间》涉及的当然更多的是“政治”和“神话”，对我的考验不如《上帝、死亡与时间》。当然，它的翻译是在《上帝、死亡与时间》之后，工作中已经少了一些畏难，而多了几分自信。

不过，在翻译了“经济”、“历史”、“哲学”、“政治”、“神话”等等之后，再回头来翻译“文学”，会有一种亲切感，好像“回了娘家”。

不属于组织交代的“任务”的非文学翻译选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理想藏书》。这是法国《读书》杂志的专家们选编的藏书书目，由著名评论家贝·皮沃介绍，皮·蓬塞纳主编。我早在一九八七年就注意到：《读书》杂志的编辑为帮助读者选择值得各人阅读的书，并建立个人的藏书架，陆续提出了一些专题的理想书目，在杂志上分期发表。后来，他们经过调查研究，在一定范围内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后，对书目做了适当补充、修改和调整，正式于一九八八年推出了《理想藏书》一书。我在法国见到这本书后，觉得有必要译过来，便先“小试牛刀”，从一九九四年起，翻译了《理想藏书》文学类的书目，连续两年在《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资料”栏目上连载全书的翻译，并于一九九六年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理想藏书》在读者中大获好评，记得，它还被《中华读书报》评为一九九七年优秀译著。去年，《理想藏书》又出版了新版，我和女儿余宁一起，为新版做了不少修订和补充工作。在自己尝试翻译了“经济”、“历史”、“哲学”、“政治”、“神话”类的作品后，再来修订同样包罗万象的《理想藏书》，便发现了以前翻译中的许多差错、漏洞。但愿新的翻译版本能尽量弥补以前版本的遗憾。

在我的文学翻译中，法国午夜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其中不少就是“新小说”，另一些则是新小说的“先驱”和“后继”。本书收了我的一篇关于翻译新小说的文章《我译法国新小说的“反复”》，它很能说明其中的种种问题。算来，我从编辑和翻译新小说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个年头了，翻译了新小说以及新小说外围作家的作品有十来部，写的文章（有的还能算得上是论文）也有十来篇。新小说的翻译，可以看作我自己翻译工作的一个缩影，而《我译法国新小说的“反复”》一文也是这种工作的真实描绘。一方面，它记叙了我翻译法国新小说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它记录了我学习和研究新小说的过程，其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工作中有得意之处：

新世纪刚刚开始的二〇〇一年，陈侗就告诉我，罗伯-格里耶刚刚写出

了一部叫《反复》的小说,作者希望我按照法国午夜出版社提供的校样开始翻译,争取中译本和法语原作在同期即秋天出版。这当然是作者和出版人的一种战略,但对翻译者的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我四月份得到校样,五一节期间开始翻译,由于时间紧,只能加班加点,用陈侗的话来说,我是“牺牲了每一个晚上和周日”,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在八月中旬完成了十一万字的译文。还有另一个原因,在此前,我刚刚翻译了同一位罗伯-格里耶的短篇小说集《快照集》和论文集《为了一种新小说》,对作品的感觉尚有余温。

也有经验教训:

以前查资料为中国读者介绍西蒙时,把《常识课》这部作品的名字翻译为《事物的教训》,因为没有读过作品,只能从字面“Leçon des choses”来理解意义,而“Leçon des choses”既可以译为“事物的教训”,也可以译为“常识课”。而翻译这部小说的过程让我知道了,在这部同名小说作品中,《常识课》本是一本小学教科书,图文并茂。这样,“事物的教训”便给我上了一堂“常识课”,成为了我在翻译工作上的一个“教训”:不熟悉就要出错!

其实,也是想以此为教训,时时提醒自己,翻译和研究,一定要认真、细致,强调材料的准确性。

古典文学的翻译,我向来反对过多的重译。我认为在我们当今的中国,重译现象实在太严重了,它导致的结果,除了出版社瓜分市场,分享利润之外,其他方面都没有什么益处,对译者是浪费,对读者会误导。

我自己对古典文学的翻译向来谨慎,除了梅里美的作品,没有做过重译。而梅里美的小说的重译,我也是被逼无奈才做的。当时,同事周启超先生约我为解放军文艺社翻译几篇短篇小说,并反复强调一定帮忙,我出于朋友之托不好推辞的脸面关系,才答应了下来,毕竟只需翻译两个短篇小说。我便翻译了《卡门》和《柯隆巴》,凑成一书,题为《卡门》,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作为他们的“大众丛书”中的一种。后来,又应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邀请,对这一译本作了大量修改,并补了《马铁奥·法尔科内》一篇,二〇〇一年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二〇〇七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选》(刘晖编选)中,又收了我的这三篇译文。

重译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是可观的,我翻译的梅里美,除了在这三家出版社出版,

拿了三次稿费之外,还在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了其中一篇《卡门》,后来《马铁奥·法尔科内》又被人看中,收在文化艺术出版社的《世界经典短篇小说》中。但对我来说,这一切实际上就是原来的三篇东西,没费什么时间和精力,倒来倒去,成了四五本书,拿了四五遍钱。

这次出版译文自选集,编辑让我多谈谈文学翻译的体会。说实在的,对文学翻译这一话题,我没有任何理论研究,只有亲身。我谈不出什么理论上的归纳,倒是有三五点具体的翻译经验。我也曾给国内的法语文学翻译青年作过几期讲座,大都是找一些文本的实例,来解剖一下“麻雀”,一些有代表性的技巧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读者如果细读,则是可以在我的译文中看出我下的功夫,花的心血的。而在这一篇“序言”中,我也就不来“王婆卖瓜”了。如要出版一本谈翻译经验的书,我倒是愿意整理一下我以前的笔记和材料,做它一桌翻译体会的“菜肴”来。

我认为,翻译的关键主要在两方面:一,忠实地理解外语原文;二,用通顺的汉语来表达。翻译界历来争论的三个标准,或者说三个难点,信、达、雅,其实都包括在这两点里头了。

而翻译工作,总的说来,没有什么捷径可走:要认真,要老实,细心,敏感,不耻下问,多查词典。外语和汉语要得有一定的基本功。语言水平高了,翻译的水平也提高了。

2012年4月12日

于北京蒲黄榆

我译法国新小说的“反复”

余中先

第一次接触到新小说,还是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尽管在大学本科时已经听说了法国有新小说。1984年,阿兰·罗伯-格里耶来访,我在北京陪同他参观访问了几天,为了更好地了解他,我便读了他的小说《嫉妒》和《窥视者》,当时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写。

当然,也是在那一年,我从理论上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当时,我对罗伯-格里耶为代表的新小说的认识大致是,法国的小说诞生以来,每一个时代都有与当时相适应的小说,巴尔扎克的小说到了某种顶峰,二十世纪的作家不应该跟在巴尔扎克后亦步亦趋,而应该创作出自己的“新”小说来。

第二年,我来到《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马上就接触到了一些新小说作品译文的编辑工作。易超(罗新璋)先生译的克洛德·西蒙(他刚刚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小说《农事诗》(选章),傅先俊先生译的西蒙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仪式上的演讲辞,都是由我做了编辑工作后在《世界文学》上发表的。桂裕芳女士译的娜塔丽·萨罗特小说《童年》,我也对着法语原文读过。

通过对阿兰·罗伯-格里耶、娜塔丽·萨罗特、克洛德·西蒙等人作品的阅读,我对新小说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尤其是对新小说的不同写法,有了具体的体验。新小说并非一个有共同写作倾向的文学流派,新小说作家们只是在一种“小说写作不应该因循守旧”的观点下团结在一起,而他们各人都有自己完全不同的创造手法。例如从写作的一些细节特点来说,罗伯-格里耶偏爱对物的精细描写,萨罗特重视挖掘人物内心的两重声音,西蒙强调文字中要透出色彩、线条等绘画因素,等等。

在这一时期,我动手翻译了贝克特的《马龙之死》和萨罗特的《金果》,但由于种种原因,它们一直放在出版社编辑的抽屉里睡大觉,但这两部对我来说相当困难的作品翻译工作,毕竟给了我相当的实践经验。差不多也是在这段时期,我翻译了罗

伯-格里耶刚刚出版的“传奇故事”《重现的镜子》中的片段,连同作者的访谈录,发表在了内部刊物《外国文学动态》上。此后不久,我出国留学去巴黎,一走就是四年多,对新小说的关注也暂时告一段落。

1993年我留学归来,旋即看到了《重现的镜子》的中译本在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出于兴趣,我挑了译文中的几个小毛病,通过朋友的关系,告诉了后来也成了朋友的出版人陈侗先生。陈侗当时有一个在中国介绍新小说(尤其是阿兰·罗伯-格里耶作品)的计划,便邀请我参加翻译,我欣然答应。就这样,我开始翻译了罗伯-格里耶“传奇故事三部曲”的第三部《科兰特的最后日子》(1994年版),同时我还对第二部《昂热丽克或迷醉》的中译文作了校订,也把我第一部《重现的镜子》部分译文的修改意见告诉了陈侗。1998年,这些作品终于出版,构成了《罗伯-格里耶作品集》的第三卷。

借着翻译罗伯-格里耶的那一股子冲劲,我又翻译了克洛德·西蒙刚刚发表的小说《植物园》(1997年法语版,1999年中译本出版),这让我大开眼界。原来以为,罗伯-格里耶与西蒙有所不同只是写法的不同,没想到不光是写法的不同,他们对事物的感觉和思维方式上也很是不同。《植物园》中跳跃不已又时隐时现的思想火花让我惊叹。而那些没有标点的段落让我理解和转达起来颇费脑筋。

尽管如此,翻译罗伯-格里耶时的经验,对我翻译西蒙还是很有借鉴的,尤其是如何对那些又长又罗嗦的句子(两位作者的作品都有这种情况,有时候一个句子就是一两页)作条分缕析,再移花接木,重新构成汉语的句子。我的经验大致是,以句子为单位来翻译,特别重视作者的句号。对那些没有标点的段落,则按照自然语气产生的停顿来安排汉语的句断。

翻译罗伯-格里耶的作品还没有完。新世纪刚刚开始,2001年,陈侗就告诉我,罗伯-格里耶刚刚写出了一部叫《反复》的小说,作者希望我按照法国午夜出版社提供的校样开始翻译,争取中译本和法语原作在同期即秋天出版。这当然是作者和出版人的一种战略,但对翻译者的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我4月份得到校样,五一节期间开始翻译,由于时间紧,只能加班加点,用陈侗的话来说,我是“牺牲了每一个晚上和周日”,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在8月中旬完成了十一万字的译文。只所以能完成得那么迅速,还有另一个原因,在此前,我刚刚翻译了同一位罗伯-格里耶的短篇小说集《快照集》和论文集《为了一种新小说》,对作品的感觉尚有余温。

翻译中,我对“反复”这个词的原文“reprise”琢磨了半天,我一开始翻译为《重复》,但认为不太妥当,因为这个词有我们汉语中“反复”、“重复”、“修复”、“重来”、“重做”等意思,一时间拿不定主意如何解决。于是,我便给作者发去传真,请教这一

问题以及翻译中的其他问题。可能是这位近八十岁的老人忘事,也可能是他不着急,回信迟迟不来,等得我有些着急。便通过朋友又去问他,同时再给他发去同一份传真。

终于,在我即将做完最后修改的8月17日,我收到了罗伯-格里耶的回信,对我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解答。经过考虑,我决定用“反复”来翻译“*reprise*”一词。他这样解释说:“重复是照原样复制,而反复是反复使用旧的因素以求改变它们,把它们推向更远。”通过这一解释,我明白了好几点:一,这部小说是对作者自己作品的反复,二,它也是对自身文化背景的反复。

当天得到罗伯-格里耶的回信,当天就修改,第二天就定稿。书名遂定为《反复》。我对新小说的翻译也在走向“反复”。

在完成了罗伯-格里耶这一部长篇、一部短篇集、一部论文集之后,我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在2003年转而再译克洛德·西蒙。这一次“反复”是为浙江文艺出版社译《常识课》(1975年版)和《有轨电车》(2000年版)。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似乎觉得这次译西蒙比起五年前译《植物园》容易多了,可能是我对这一类的小说不再陌生,做翻译也不再畏惧了的缘故吧。说不再陌生,有一例子可以为证,以前查资料为中国读者介绍西蒙时,把《常识课》这部作品的名字翻译为《事物的教训》,因为没有读过作品,只能从字面“*Leçon des choses*”来理解意义,而“*Leçon des choses*”既可以译为“事物的教训”,也可以译为“常识课”。而翻译这部小说的过程让我知道了,在这部同名小说作品中,《常识课》本是一本小学教科书,图文并茂。这样,“事物的教训”便给我上了一堂“常识课”,成为了我在翻译工作上的一个“教训”:不熟悉就要出错!

再后来,我又忙着翻译贝克特,我直接从法语翻译了他的著名剧本《等待戈多》,还有他的小说《无法称呼的人》、《马龙之死》(修订译文,再来一次“反复”)、《看不清道不明》、《如何是》等等。这些本来非常难的小说,连篇的呓语和梦话的独白,也变得难度低了很多,细细想来也是,我毕竟在近二十年的新小说翻译(包括编辑)中,对不同作家的写作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和把握。

贝克特的作品选集在中国成功出版的同时,我还要补充一句,贝克特本身不是新小说作家,但他是法国新小说家们比较崇拜的一位,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新小说的先驱,或精神同行,尽管他是以荒诞派戏剧家的身份出名的。

说过了先驱,还得说一说后继者。目前在新小说的“出版基地”午夜出版社发表作品的新一代作家中,有好几位被看成是新小说派的自觉继承者。我翻译了其中的两位,一位是让·艾什诺兹,我翻译了他的小说《我走了》(1999年获龚古尔文学奖),另一位是让-菲利普·图森,我先译了他的《做爱》(2002),后译了他的《逃跑》

(2005)。《做爱》和《逃跑》都与作者在中国和日本的旅游经历有关,其中有的素材显然是我亲自经历过的事情,这也让我感到熟悉和亲切。前者对题材得心应手的把握,点到为止的处置,后者极其简洁的文字和优美的文笔,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与图森先生有联系,在翻译中可以借助 E-mail 向他求教,并及时得到指点,不必跟等待罗伯-格里耶先生的传真那样等上老长时间。这是跟新一代作家打交道时的另一种乐趣,也是我在翻译已经逝世的老作家时从不曾有过的一种经验。接到他们的 E-mail 和他们给我的确切答案时,那种感觉真好! 邮件的这一来一往,“反复”的过程加快了好多。

(原载于《一本书和一个世界》(第二集),昆仑出版社 2008 年版)

目 录

小说

钱拉·奈瓦尔

001 奥蕾莉娅

045 西尔薇娅(瓦卢瓦的回忆)

普罗斯佩·梅里美

072 卡门

120 马铁奥·法尔科内

居伊·德·莫泊桑

131 郊游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141 奥诺雷·苏布拉克的失踪

145 遥控感触

让·季洛杜

154 匿名信

157 生涯

朱利安·格林

160 克里丝蒂娜

于连·格拉克

167 科夫图阿王

阿兰·罗伯-格里耶

193 三个反射视象

达尼埃尔·布朗热

200 马雷朗热先生的乐谱

帕斯卡·吉尼亚

213 世间的一切清晨

散文

德尼·狄德罗

250 旧袍叹

保尔·克洛代尔

256 摩托车

260 电话

米兰·昆德拉

264 寻找失去的现在

安托南·阿尔托

279 地狱日记片断

284 爱洛绮丝与阿贝拉尔

287 梦